

街面忆往

# 老曲的绝活儿

滕永顺/口述 孙启华/整理

我1970年参加工作,当时还不到16周岁,在芝罘区老北大街大庙戏台对面的“立新”百货商店干临时工。“立新”百货商店包括分店当时有100来人,老曲也是其中的一员。

老曲中等个子,中山服总是干净整洁,领钩扣得一丝不苟,头发整得熨熨帖帖、一丝不乱。除了夏季,老曲头上总是戴着帽子,春秋冬季是卡其布的,冬天则换成了呢子的。中山服的上衣口袋里永远插着两支笔,一支钢笔用来打支票,一支油笔用来开发票。不管是上班、下班,抑或是早晨的爬山晨练,老曲的钢笔永远是插在上衣口袋里的。大家经常拿老曲的两只钢笔开涮:插一支钢笔是小学毕业,插二支钢笔是中学毕业,插四支钢笔就是大学毕业了!老曲笑眯眯的,从来不恼。

老曲说话轻声细语的,无人能比的优势是能“黏住”顾客。只要老曲在柜台上站着,大闺女、小媳妇、大妈、小婶子们都愿意奔着他去。老曲习惯性地笑脸相迎,说长道短中,总能让顾客高高兴兴地将商品买下,不服不行。店里的同事们常常拿老曲的“女人缘”开玩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老曲退休后,曾和原大马路商店的老汤一起在西大街百货商店、市府街百货商店、大马路百货商店外摆摊,叫卖处理的布匹。他的摊位前,总是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老老少少,这一幕,相信很多老烟台人都有印象。

老曲能干,喜欢听好话。商店月末、季末都要进行商品盘点,货架、仓库都要一笔不漏地翻个底朝天,这对于身单力薄的女售货员来说,是件费时费力的大工程。每当这时,如果你好言好语地请老曲帮忙,老曲会不遗余力,干得比负责人、售货员还起劲儿。

老曲是牟平人,小时候家境相当不错,老家有房子有地,老曲是家中的独子,娶了个媳妇,丈人家条件比他家还好,在周围十里八村都有名气。老曲十几岁的时候就上烟台的“协隆”绸缎庄学生意了。老曲很为自己曾在“协隆”学生意自豪,每每谈起,总是情不自禁地说:那时候能进“协隆”学生意,不亚于现在的孩子考中了清华北大。老曲说:到“协隆”学生意的小伙子,除了学基本的业务技能,站柜台仪容仪表也必须拿得出。那时候没有这个膏那个霜的,为了让皮肤细嫩,晚上睡觉时,伙计们都把粉涂在脸上,然后蒙上毛巾入睡。第二天洗干净脸才能上柜台。老曲平日里总是板板正正的仪表,得到了最好的注解。

老曲量布也是一绝,我曾经亲眼见识过。有一天,棉布组的售货员在量布复核尺码,一匹布一百米左右,如果按常规量尺,一米一米量过去,布就在右手边堆成了一堆,量完以后还要再重新将布码好,费时费力。老曲进货回来,看到大家在量布,那天大概是心情不错,说了句:看我的。一匹布摆在柜台上,老曲不是像一般的售货员用米尺量,而是拿了一把一尺长的小尺,从最上一层布开始,左手扯着布,右手拿着尺,腰随着翻飞的

双手,左右转动着,量完的布一层一层顺序地向外翻折,眨眼的工夫,一匹布就量完了,把折向外面纹丝不乱的布向胸前一拢,这匹布仍像原先一样整整齐齐,老曲得意地将小尺向脖后的衣领一插,完活。布还能这样量!当时把大伙都看呆了。

公私合营以后,老曲曾在大庙百货商店棉布组站柜台,后来到鞋帽组干进货员。进货员的职责是:组织货源、到二级站打货,到仓库提货并将货带回店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货员的运输工具就是一人一辆自行车,商店里所有的货物都是进货员一车一车带回来的。一般的进货员一趟能带两三个货箱就算不错了。老曲在鞋帽组进货时,一车能带五大箱高腰水鞋!高腰水鞋很大,一箱十双,一箱有大半个写字台那么大,这五箱鞋光绑车就得极好的技术。我干进货员时,曾专门跟老曲学过:老曲先用一根绳把两箱鞋竖着绑在自行车后座的两旁,这样就等于加宽了自行车后座,再用一根绳将其他的三箱鞋横着绑在自行车后座和鞋箱组成的平面上。老曲骑上车以后,从后面看,只见货箱不见人!这么重的车,上车、骑车、下车都需要很高的技术,上了车以后,基本就不能再下车了,要一直到店里才能停下。那时的百货仓库在芝罘屯的是十三库,在世回尧的是南山库,尤其是南山库,从南往北一溜大下坡,车重路陡,十分难驾驭。有一次,我们店的进货员小马也跟老曲学着带五箱货,结果从世回尧走到工人文化宫时遇到意外情况迫不得已下了车。一下车,自行车车把像高射炮一样高高翘起,够不着,压不下,急得小马直跺脚,在好几个路人的帮助下,才把车压下来,扶着重新上了车,好歹把货带回来了。

我参加工作时,老曲住在三马路一个独门独院的小房里。我们不管啥时候去,小院总是干干净净的。老曲一辈子生了十个孩子,老伴没有工作,一个人的工资养活这十二口之家,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十张嘴嗷嗷待哺,为了养家糊口,老曲利用休班和节假日,偷偷地骑自行车在车站码头干起了“带座”的营生,挣两个苦力钱。一次,一个去牟平的老客坐上了他的自行车。这趟活道远,送到牟平再回来,来回要100多里路,路还不好走,中间有好几个老大老大的坡。老曲上了车蹬着就跑,坐在后座上的老客越看越觉得熟悉,突然冒出了一句:“少爷,是你啊?”老曲回头一看,原来是同村的。从那以后,“少爷带座”的事就在村里传开了。

老曲和他老伴巴巴结结地把十个孩子都养活了。孩子们结了婚,成了家,老两口刚刚想喘口气,老伴却在小老太结婚后仅半个月就去世了。老曲一提起老伴,就难受得不得了:“老伴跟着我,忙活了一辈子,一天好日子也没捞着过。”

老曲叫曲焕章,活着的话今年有100岁了。

往事如昨

## 从军路上的良师益友

王功良

1993年元旦过后,师干部科张晔科长把我从炮团调到了师机关,由营部军医转身成了政治部干事。

这个改行跨度有点大,以至于师政委吴基贵疑惑:政治部怎么调来一个军医?

其实,当军医非我所愿。当年考军校时,我的志愿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我以五门功课几乎全部满分的成绩,位列原济南军区十分部考生第一名。但是,军区把成绩前80名的考生统统录取到军区自己的最高学府——原济南军区军医学校。不管报考志愿是哪里,一刀切,一切服从组织安排,真是命不由己,造化弄人。

在军校,整天面对的是细菌、代谢、器官等概念,在不喜欢的领域读书上课,实在是苦不堪言,以至于郁闷地想退学回家。

毕业后,我顺理成章地成为基层连队的军医,除“四害”讲卫生搞防疫,连队战士有个头疼脑热的,我先开点药对付对付。

说起来,我喜欢新闻报道,想当军事记者,自费订阅了《新闻与成才》《青年报人》等杂志,自学了南京政治学院的新闻课程,从师里走出去的军中名记者胡彦伟、黄群文等人是我的偶像。我曾站在灯火阑珊的白浪河畔,羡慕地远眺138师宣传科窗口的灯光,渴望跻身其中的心情无以言表。无奈军医和干事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当时想,纵使望断天涯,怕也难以实现夙愿了。

张晔科长调我到师干部科,真是实现了我的愿望,“进一步庭院,添十分春色”,人生顿觉一片光明。

我与张晔科长素不相识,从未谋面。那时,我当军医空闲时间较多,百无聊赖时,就试着写稿投稿,各报刊偶有发表,干部科资深干事孙亚松注意到了报刊上的名字。孙干事对全师800多名干部都比较熟悉,在基层干部中威望很高,当年我来师里报到时,就是孙干事为我办理的手续。如今科里出现了空位置,孙干事热情地推荐了我。经过考察了解等一系列程序,我就去政治部报到上班了。

师干部科担负着全师的干部福利、任免提拔、调整配备、转业安置、档案管理等工作,是部队的组织部,岗位重要,实非儿戏,要适应政治部机关的工作,一切都得从头开始。

张晔科长老家是菏泽郓城的,正派善良。他平时不苟言笑,一脸的团结严肃,工作要求很严格很扎实,经常会就工作细节问得你哑口无言,我怕出差错,见他总有点打

怵。为了让我尽快适应并胜任工作,张晔科长和孙干事等老同志手把手地教我,请示报告、沟通协调、联系部队、撰写材料、工作落实等等,不久我就适应了工作,虽然有点愣,但也能圆满完成任务。

转眼就是中秋,我寻思着,干部科干事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职位,张晔科长对我恩重如山,趁着过节,于情于理,应该表达一下谢意。夜色朦胧中,我提着两斤桃酥和两瓶酒,第一次走进科长家。

张晔科长坐在老旧的木把沙发上,手里夹着香烟,脸上依然笑容不多。听我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科长缓缓言道:“调你来干部科是组织的信任,不用感谢我。你把本职工作干好了,就是最好的回报。”接着,科长又对机关工作特点谈了认识,对我的部分工作进行了点评,对工作创新的突破点进行了分析。总之,不收礼。

无奈,我僵硬地把礼物提回来了。送礼不成,反倒上了一堂思想教育培训课,尴尬之余,也感受到老同志的板板正正。

往后的日子,我工作更加勤奋,在这个团结友爱的集体里,大家互帮互助,真挚交往,在做人做事方面,我从张晔科长等战友身上学到了很多,言传身教之下,自身能力素质也提高很大。

1995年,我所在的军承担了全军“管好干部带好兵”教育试点,我负责我师大型展览的文字解说、摄影主创和展板制作工作,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师政治部廉书义副主任带队跑遍了全师各个团,我用120个胶卷拍摄了有关主题的画面,展示了我师在干部管理和带兵方面的成功经验,时任部队首长参观展览后对试点工作很满意。活动成功举办,廉书义副主任高兴地对我说:“没想到你含秀不露啊,你要注意多展示自己,今年年底给你立功。”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1996年我转业回到了烟台,张晔科长也提拔到福山炮团当了政委。在去新单位报到之前,我再次俗气地拿着两斤桃酥和两瓶酒,来到了福山炮团。走进营区左拐的一排简易平房,那是团领导的住处,我对老科长说,转业干部来走亲戚,这次您可得收下,不然影响军地关系不说,亲戚也做不成了。老科长高兴地说,那午饭咱们就吃桃酥……

我总觉得,能认识张晔科长、孙干事是命运对我的一次眷顾,他们是我人生旅途中遇到的良师益友。我很珍惜这份真情,温馨而难忘。